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

1940年攝於香港薄扶林道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記施蟄存先生對我的指導

■ 小思

本名盧璋鑾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熟悉中國現代文學的人不會不知道施蟄存的名字，但我認識他，卻有點特別——不是先從他的作品入門。

遠在一九七八年，那個年頭，在香港我還沒讀到現代派小說，或稱新感覺派小說的機會，但早就知戴望舒、施蟄存的名字。特別是戴望舒，他在香港的文藝活動，正進入我的研究視野。在《星島日報》的文藝副刊《星座》上，我認識了施蟄存的散文作品；又從零散文學史料記錄中，知道他和戴望舒的友誼與文壇合作關係。要研究戴望舒在香港，除了在報刊版面找尋他的作品外，其他材料，非常缺乏。如何尋得更活的材料？我第一個念頭，就是訪問戴氏的朋輩。可是，文化大革命剛過去，香港與大陸的學術、文化界的相隔還沒有消解，人際更難連線。我首先去訪問了卜少夫先生，他說了一大堆名字；全都跟戴望舒很多交往；他特別強調必須訪問施蟄存，因為他應該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記施燕存先生對我的指導



1983年與夫人陳慧華合照

及出版社所有
不翻印

了解更多。時維一九七八年，要到大陸向沒有連繫的人做訪問，真有點異想天開，我只好把一個個名字抄在卡片上，記在心底，繼續做我的文字搜尋工作了。

一九七九年六月初的一天上午，馬蒙老師把我叫到中文系辦公室去，介紹一位中年女士給我認識。「這是楊靜女士；她想找些戴望舒資料，你帶她去圖書館，看看她需要些甚麼。」馬老師似乎跟她也不熟悉，這種突然上門的訪客很多，老師已經習以為常，今回大概因為與我研究項目有關，才把任務交給我。「楊女士剛從上海來，你多照應一下，她是戴望舒夫人。」吓？戴望舒夫人？做過資料蒐集的人都有經驗，一見到聽到與研究有關的名字，就會心中一震，眼睛放光，何況眼前就是戴望舒太太！當時的驚喜，令我呆了。這真是天賜機緣。

從以後的交往中，我發現楊女士對丈夫的文學創作及活動所知不多，她只希望找些作品回上海，讓出版社出此書，我實在無法在她口中獲得任何文學線索，那種失望與當初的驚喜，反差極大，但我仍希望能從她的回憶裏，攝取一些戴望舒的生活點滴，以助解讀作品。她的出現，對我最重要的影響，應該是作為我認識施燕存先生的介紹人。中國剛開放不久，香港是內地文化人想吸「新鮮空氣」的南風窗口。她來港前，施先生委託她留心香港有關現代文學及古典文學出版物，她對我說，她對文學外行，加上人地生疏，很希望我能幫忙。那還會拒絕嗎？於是我獲得施先生的地址，寄出第一封信。

這第一封信真難下筆。詳細內容忘記了，大概首先自我介紹一下，並說樂意為他買書和複印所需資料。不

及出版社所有
不翻印

久就收到施先生回信，信中除了開列一些需要的書刊外，（他首要買的是香港出版的《中國現代抒情詩一百首》、《現代中國詩選》，可見幾十年大陸的文藝政策、主流意識型態，並沒有沖淡他對現代詩的關注。）誰料信中有一段，卻給我結結實實的教訓，也許該說是鼓勵，如今細讀，我仍感到親切。「來函最後一句『反正我是個很平凡的女教師』使我有點驚異，似乎你對自己的職位有點輕視，或者有點不滿情緒，你是港大助教，即將得碩士學位，前途遠大，並不平凡啊！我國現在迫切需要現代化，正在積極從事經濟和文化的國際交流，而香港正是這種交流的橋樑，你給我的幫助，已經是在負起文化交流的橋樑工作。……我誠心希望你不要如此自卑、自謙。」我的「句『平凡的女教師』，本來只是身份敘述，沒有甚麼自卑自謙的含意，更沒有不滿情緒，卻引起施先生的關注，一板一眼的給我鼓勵。在以後交往多了的日子中，我才明白一板一眼說話，並不是施先生的風格，冷幽默、話中帶諷、風趣、機智，才是他個性特色，那一板一眼的情況，不太常見了。」

八十年代初，施先生跟我的通信內容，許多都與我的論文有關。例如他提供了許多戴望舒筆名，其中鮮為人知的、施戴兩人共用的、或是至今存疑的。由於這新得資料，我必須從頭再翻閱一次《星島日報》的《星座》，尋出首次閱讀時錯過了的二人作品；也正因如此刺激，令我痛下決心，抄錄了《星座》全部目錄，這就是今天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「香港文學資料庫」網頁所見的索引條目。（想起當年蠅頭小字逐一抄寫卡片，回家再排入小檔中，比起如今按鍵即見的方便，真有天淵

記施繁存先生對我的指導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之別。)特別重要的是，他對我的研究方向，論文重點，提出了極寶貴意見。例如他曾提點我：「你擬定的那個研究題目極好，你有條件可以進行探索。當時香港文藝協會的會員名單你找到了沒有，先要查一查那段時期有多少人在香港。至於你的研究目的，我以為「活動」容易寫，「影響」則較難。總的態度，則應站在香港人的立場上作客觀敘述為穩重。」這意見十分重要，因為當年我對資料掌握並不足夠，有多少中國作家曾到香港、他們政治立場如何、左右派之間的鬥爭複雜糾結情況、他們怎樣利用英殖民地的民主空間推展不同的文藝策略等等問題，全然空白一片，最頭痛的是沒有任何背景參考書足供支援，在這種貧乏無知情況下，絕對無法談「影響」，只能努力陳列資料，反映活動情況。至於「應站在香港人的立場上作客觀敘述」：這一提示，更確定了我以後的研究態度：施先生在另一封信中說：「對於你的論文，我建議你要注意一個問題，不要完全用此間的文藝批評尺度立論，那還是太『左』，你們香港人無須走到如此之遠，我以為你的論點，只要做到『客觀』、『持中』就可以了。」這段話，在今天看來，可能有人認為無甚高論，但時維一九八零年，身在上海的他，對一個初識而又「來歷不明」的香港人，說這幾句話，也必須冒一些風險。至今我對他的無私的幫助，仍深深銘感。由此，我更堅信「香港人客觀敘述」，是研究必具條件，而香港這空間，是釐清某些蔽礙的理想地方。

在另一信中，施先生提議我的論文題目，可以用《抗戰期間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活動 1937-1941》或《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活動 1937-1941》，我最初用上差不多的題目，是《現代中

國作家在香港的活動》，經施先生提點，應標出年限，既可免除「現代」二字，又能明確界於中國抗日始至香港淪陷這段時期。又由於我想避開當時作家參與的某些政治活動——避開的原因，是當時我還未弄清楚那些曖昧、隱閉的政治關係，最安全就是限於「文藝」範圍。至於「活動」，就方便資料鋪陳，幾乎不必涉及作品分析。最後定出論文題目就是《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 1937-1941》。

一晃二十多年，在往來書信中，我沒有說過感謝的話，只因無法用文字表達我的謝意。到了九十年代末，我很少寫信，為怕要他費神回信。記得他在一九八九年三月，他寫過十段順口溜給我：其中第七段是這樣的：「燈下寫信覆朋好，來信太多覆信少，每天收信六七封，叫我如何覆得了？」順口溜寫來看似輕鬆，但內裏倒含不少生活況味。到一九九八年十一月，施先生來了，一封短信，說希望我有個來信，講講近況，他更說寫字不靈活了，記憶力差了，最後慨嘆「人生真如電光石火，可悲。」讀着他的信，我心中隱隱作痛，要執筆寫信，卻不知道從何說起。

除了指導我的論文外，施先生更熱心的指導過我的學生，而在不多的幾次見面機會中，他更留給我極難忘的印象，這一切，我都應好好寫下來，因為他實在是位很可敬又可愛的前輩。在此，我先記下他對我的指導，並讓他知道他對我的影響多大，到今天，我仍堅守客觀持中的研究態度，我想，這比說多少句感謝說話，來得更能表示我的謝意。

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四日於香港